

试论转型进程对捷克斯洛伐克 联邦解体的影响

姜 珺

【内容提要】 20年前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是制度安排、民族心理、政治精英和现实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向西方民主制度转型仅是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的现实因素之一,但在社会全面转型背景下,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共同国家的维持难以为继。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等角度分析转型进程对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的影响。

【关键词】 捷克 斯洛伐克 联邦解体 社会转型

【作者简介】 姜珺,197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1992年12月31日至1993年1月1日的午夜,捷克斯洛伐克宣告解体。与苏联和南斯拉夫不同的是,它的解体没有出现流血冲突和紧张局势,是在双方政治精英协商谈判基础上实现的快速和有序的“天鹅绒分离”。文明的解体方式以及联邦解体后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长期保持特殊伙伴关系,为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和联邦制国家和平解决民族矛盾提供了范例。然而,在多数民众要求保留共同国家的情况下,联邦国家依然一分为二,至今仍然被一些对共同国家怀有深厚感情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认为是一个错误的政治决定。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是历史、制度、社会心理、政治精英和现实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等角度分析转型进程对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的影响。

一 政局剧变后中东欧国家转型 的多重性与同时性

在20世纪90年代初,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中东欧国家同时进行了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层面的多重转型。在政治制度上,从苏联模式的集权体制向多党议会民主制转型。在经济制度上,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外交方面,从受苏联控制和影响转向积极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在社会层面,从社会纽带松弛、个人与公共世界疏离以及社会规范失灵的社会,向积极的公民社会转型。

由于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西方理论界一度出现了关于何种转型有优先权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政治民主化和制定宪法在时间上应该领先,以便为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创造条件。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一定

程度的经济稳定是民主的必要前提条件^①。

与中欧邻国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单一制国家相比,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转型进程更为复杂,需要改变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的共存形态。在1989年政局剧变前,许多斯洛伐克人以及相当一部分捷克人对“正常化”时期变形的联邦制感到不满。政局剧变后不久,联邦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就提出要寻求新型、更好和确实公正的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共处一国的模式。1991年12月,他在联邦议会发表演讲称,“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希望在什么样的国家生活,就难以解决当前社会需要解决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②对国家权力安排长期抱怨的斯洛伐克人主张,如果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不能在经济转型进程开始前得到解决,就应该与经济转型问题同时解决。

鉴于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两个组成部分对另一方的提议都具有否决权,其政治精英又高度强调各自的民族利益,1990~1992年他们共同寻求对双方有利的伙伴关系模式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1992年6月议会大选后,对国家权力分配问题影响经济转型进程深感不满的捷克政治精英,迫使要求越来越多民族主权的斯洛伐克政治精英在中央集权型的联邦制国家与两个民族共和国完全独立之间做出选择。于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联邦国家一分为二。捷克政治评论家伊日·贝赫表示,1989年政局剧变后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痕也许可以通过给予斯洛伐克更多自主权或将联邦转型为邦联等方式解决,但由于捷克和斯洛伐克关系的调整发生在同时进行多重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其他许多紧迫的转型任务使捷克和斯洛伐克关系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③。

二 政治转型对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的影响

(一) 政党政治的地方化

在多民族国家崩溃前,通常存在全国性政党消亡这一现象。1990年1月,联邦议会通过《政党法》,赋予公民自由组建和合并政治团体的权利,从而为实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创造了条件^④。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逐渐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政治舞台。

首先是全国性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下简称捷共)分裂。在剧变后新的政治形势下,1989年12月21日举行的捷共第十七次特别代表大会做出了关于政党实行彻底联邦制的决定,以满足斯洛伐克改革派共产党人的要求。1990年1月20日,彼得·瓦伊斯当选斯洛伐克共产党(以下简称斯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斯共逐步走向完全独立的道路。同年3月31日,在布拉格举行了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以下简称捷摩共)的成立大会。斯共改名为民主左派党,并向社会民主方向转型,而捷摩共对党内改革持犹疑和谨慎的态度。1991年年末,民主左派党退出与捷摩共的政党联盟。

其次是其他传统政党难以突破民族—区域的限制。政局剧变前在捷共领导的民族阵线框架内还有一些政党合法存在,它们是在捷克共和国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党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在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自由党和斯洛伐克复兴党。这些传统政党也试图扩大选民基础至另一个共和国,但均未获得成功。从1990年年初起,斯洛伐克所有政党都打“民族牌”,都重视民族纲领和捷克—斯洛伐克关系问题,只是对斯洛伐克独立程度的要求有所不同。由于捷克的政党不能在重新界定斯洛伐克地位问题上给出令人满意的构想,斯洛伐克选民对它们不感兴趣。同样的,捷克选民对试图扩展影响力至捷克地区的斯洛伐克政党也不感兴趣,认为它们过分强调斯洛伐克地位问题。

最后是新成立的政党倾向于成为地方性政党。根据1990年通过的选举法,一旦政党能够在—一个民族共和国获得5%的选票,就不仅可以进入民族共和国的议会,而且可以进入联邦议会。在民族共和国范围内争取选民支持,既便于组织活动,又可以集中精力于地方选民的吁请。

^① Eric Stein, *Cesko - Slovensko: konflikt, roztržka a rozpad*, ACADEMIA, 2000, s. 242.

^② Václav Havel, *Projev ve Federálním shromáždění*, Praha, 3. 12. 1991, In: *Vážený občané - Projevy*, Cervenec 1990 - červenec 1992, LN, Praha 1992, s. 123.

^③ Jirí Řehe, *The split of Czechoslovakia: A Defeat or a Victory?*, <http://www.pehe.cz/prednasky/2004/the-split-of-czechoslovakia-a-defeat-or-a-victory>

^④ Pavol Petruš, *Slovensko v rokoch 1989 - 1998*, Metodické centrum Prešov, 2000, s. 10.

在1990年6月和1992年6月同时举行的联邦议会和地方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几乎都是仅拥有一个共和国选民支持的政党,没有政党在捷克国民议会和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同时获得议席^①。在两个民族共和国框架内形成两个完全自治的政党体系,不利于捷克—斯洛伐克关系的调整。其原因是,在政党体系分裂的情况下,主要政党和联邦政府领导人仅替一个共和国而不是两个共和国的选民说话,致使在关于国家权力安排的谈判进程中缺乏代表全国选民利益的政党,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设想大相径庭。斯洛伐克人希望建立较为松散的联邦,民族共和国拥有尽可能大的权限。捷克人则倾向于中央集权型的联邦,认为主要权力应该集中在联邦中央。由于参加谈判的双方政治精英都不愿意在两个民族相互关系关键性问题上做出妥协,联邦议会通过新宪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改变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共存模式的希望也就越来越渺茫。

(二)“禁止以多压少”原则引发的宪政危机

为了避免人口数量是斯洛伐克两倍的捷克人在议会投票过程中轻易以多数票击败斯洛伐克人,1968年通过的关于联邦制的宪法法律及1970年通过的关于联邦制的宪法修正案,不仅规定在联邦议会的民族院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拥有同样多的议席,而且确立人民院和民族院均实行“禁止以多压少”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通过一些关于国家重要事务的法律时,如公民资格、预算、税收和对政府表示信任时,需要民族院捷克议员和斯洛伐克议员分别绝对多数的同意;在通过新宪法或宪法修正案时,则需要人民院所有议员3/5多数的同意和民族院两个部分分别3/5多数的同意。这意味着,31名斯洛伐克议员或捷克议员(大约是联邦议会两院所有议员的1/10)就可以阻止宪法或宪法修正案的通过,38名斯洛伐克议员或捷克议员就可以阻止任何重要法律的通过,或在政府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时推翻政府。

在1989年政局剧变前,“禁止以多压少”原则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所有的议员都服从捷共的领导,没有发生过民族院捷克议员与斯洛伐克议员在表决时意见不一致的情形,任何与捷共中央不同的声音均遭到压制。在政局剧变

后联邦制的权力结构民主化条件下,“禁止以多压少”原则获得实际意义,一个民族拥有了否决另一个民族的权利,特别是较小、较弱的斯洛伐克民族获得强大的讨价还价地位^②。捷克政治学者卡雷尔·沃季奇卡认为,联邦制建立之初确定的“禁止以多压少”原则预设了政局剧变后不可解决的宪政危机,它的爆发仅是时间问题^③。

1990年6月议会大选后成立了新的联邦议会,其使命是在未来两年内起草和通过一部新的民主宪法。只有捷克与斯洛伐克双方政治代表达成协议,才能确保议会通过新宪法所需的票数。由于捷克与斯洛伐克政治代表对斯洛伐克地位问题的认识截然不同^④,制定新宪法的任务难以完成。

“禁止以多压少”原则的实行还导致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一度缺少总统。1992年7月3日,联邦议会举行了首轮总统选举,时任总统哈韦尔为唯一候选人。鉴于民族院75名斯洛伐克议员中仅有22名议员投了赞同票,哈韦尔落选。在同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民族院只有18名斯洛伐克议员投了赞同票,哈韦尔再次落选。7月17日,一直致力于维护联邦国家继续存在的哈韦尔辞去了总统职位,他从此致力于成为未来独立的捷克共和国的总统。直至联邦解体,总统的位置一直空缺。

(三)新闻自由的滥用

随着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爆发,捷克斯洛伐克开始重建公共信息的公开渠道。媒体开始自由地发表评论,1990年3月修订的新闻法允许私营企业发行报刊。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不仅原先处于地下状态的刊物开始公开发行,而且涌现出许多新报刊。

在民主化进程的初期,政府的新闻垄断逐渐被打破,公民社会得到蓬勃发展,可民主制度还没

^① 只有1990年议会大选中捷共除外。Carol Skalnik Leff,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 Nation Versus State*, Westview Press, p. 134.

^② Eric Stein, *Cesko - Slovensko: konflikt, roztržka, rozpad*, s. 133.

^③ Karel Vodicka, Ladislav Cabada, *Politický systém České republiky*, Portál, s. r. o., Praha 2003, s. 116.

^④ 捷克方面认为,斯洛伐克努力获得更大程度的自治将阻碍转型任务的完成。斯洛伐克方面则认为,更大程度的自治是国家真正民主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有完全生根,突然开放的公共讨论往往促使形成民族主义神话和激发种族冲突^①。

由于独立、自由的新闻媒体是新生事物,捷克与斯洛伐克的新闻记者没有做好准备,新闻业的整体水平较低。其主要表现为:不报导媒体辩论;存在夸大观点差异的倾向;很少有人客观地研究联邦解体可能带来的后果;报刊几乎无一例外地为一定的政治取向服务;“捷克与斯洛伐克谁贴补另一方”的话题充斥报刊,导致舆论的激进化^②。面对蓬勃发展但放任自流、不负责任的新闻业,捷克斯洛伐克执政当局也逐渐表示担忧。哈维尔总统的新闻发言人米哈尔·赞多夫斯基曾提出,言论过于自由是一个现实问题,应该用新闻责任冲淡言论自由^③。

出于对捷克人传统的成见,斯洛伐克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话语——“捷克人倡导的经济转型使斯洛伐克受到损害”——在斯洛伐克人中间广为流传。而捷克人对斯洛伐克的忽视、不了解,导致捷克新闻记者匆忙做出反应。他们指责斯洛伐克人是秘密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群体。1990~1991年,捷克新闻媒体的不友好态度,致使斯洛伐克那些拥护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和与捷克人共同进行经济转型的人士在民众中的信誉下降,他们中的多数在1992年议会大选中落选^④。

捷克与斯洛伐克之间的大众媒体战争,导致双方民粹主义情绪获得极大释放,近两百年来形成的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的相互成见愈益加深。双方媒体还开始以不正当的方式互相揭短。捷克新闻记者揭露斯洛伐克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令人担忧的生存地位,斯洛伐克新闻记者则大肆报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捷克人遣返境内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的历史^⑤,结果双方民众开始相互排斥和反感。

在斯洛伐克政治流亡者的宣传鼓动下,一小部分斯洛伐克民众开始公开追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张斯洛伐克自治、分离和独立的政治代表。捷克媒体对此反应激烈,但由于捷克记者在报道中混淆斯洛伐克历史人物,使斯洛伐克民众感到非常愤怒。

捷克著名的评论家杨·乌尔班在1993年的时候表示,如果当时新闻记者能够表现得像独立的专业人士,而不是在政治领导人发表的宣言中添加人为筛选出的历史片段,或对事实和观点不

加以区分,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分离就可能不会发生。尽管乌尔班的观点有些夸张,但新闻媒体的不专业和不规范确实对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关系的恶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 经济转型对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的影响

(一) 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对经济转型的不同设想

1990年春,在联邦层面出现了两种经济转型构想的争斗,一种是以逐步建立私营部门为前提条件的渐进模式,另一种是以实行快速、大众参与的私有化为起点的激进模式。不久,联邦财政部长、捷克政府副总理、“公民论坛”主席瓦茨拉夫·克劳斯倡导的激进转型模式在政治博弈中占了上风。激进转型模式符合捷克地区多数民众的期望,他们希望彻底改变经济现状,并重新回归欧洲发达国家行列。捷克地区曾属于奥匈帝国经济最发达的部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发展成为世界十大工业国之一,而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捷克地区。在社会主义时期,捷克斯洛伐克逐渐从欧洲工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靠拢。至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水平在中东欧国家中保持领先地位,但仅达到发达国家的50%左右。对1948年后经济地位下降深感不满的捷克人,在1989年政局剧变后热切期望重新挤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因此,捷克人普遍接受激进经济转型。

然而,激进转型模式与斯洛伐克多数民众的愿望不符,其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在1948~1989年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于中央政府在财政方面重点支持斯洛伐克的经济的发展,其现代化进程得以加速推进,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方面取得

① Jack Snyder and Karen Ballentine, Nationalism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http://nationalism.org/library/science/nationalism/snyder/snyder-ballentine-is-1996.htm>

② Eric Stein, Cesko - Slovensko: konflikt, roztržka a rozpad. s. 234.

③ Carol Skalnik Leff,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 Nation Versus State. p. 113.

④ Jiri Musil, The End of Czechoslovakia,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Budapest - London - New York, p. 136.

⑤ 这一有争议的历史事件一直困扰着捷德关系。

显著成效,人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都得到大幅提升。因此,斯洛伐克民众要求迅速、彻底改变经济状况的愿望并不迫切。其二,斯洛伐克与捷克有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抗转型冲击的能力较弱。捷克裔的美国经济学家杨·什维伊那尔认为,1989年时,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的主要经济指标非常相近,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即斯洛伐克的失业率是捷克的3倍。斯洛伐克高失业率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结构,工业生产部门相对集中,且军工企业众多^①。在联邦政府设计经济转型方案的同时,一些斯洛伐克经济学家主张实行独立的、与捷克平行的经济转型。他们认为,斯洛伐克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其经济杠杆应该掌握在斯洛伐克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手中。与克劳斯的激进转型构想不同,他们强调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以避免快速私有化与取消国家补贴在斯洛伐克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②。斯洛伐克独立实行渐进经济转型的构想得到一些斯洛伐克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却遭到联邦政府的拒绝。

(二) 经济转型对捷克与斯洛伐克造成的不同冲击

1991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开始实行激进转型措施,旨在尽快实现体制变化。于是,多数商品价格实现了自由化,取消了对企业的补贴,实行了统一的纳税标准,完全放开了商业贷款,取消了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改变了克朗的汇率,实施了严格的预算政策。转型进程开始后,民众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社会问题逐渐增多,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与捷克相比,斯洛伐克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更为严重。

在社会主义时期苏联视斯洛伐克为重要战略地区,故在斯洛伐克工业化过程中建造了许多加工原材料和生产武器的大型企业。斯洛伐克军工转产问题成为斯洛伐克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批评联邦经济改革计划的一大论据。1988年,捷克斯洛伐克有36家大型军工生产企业,其中25家位于斯洛伐克,大约有10万名工人,军工产值占斯洛伐克工业生产总值的6.3%^③。至1992年,斯洛伐克军工产值已下降到只占工业生产总值的0.9%。军转民虽然存在许多方案,联邦政府也许诺帮助斯洛伐克军工企业转型,但由于资金不到位而导致转产进程困难重重,1991~1992年只有

半数斯洛伐克军工企业实现了转产,有3.5万斯洛伐克人失去了工作岗位。在没有充分考虑到斯洛伐克经济形势的前提下,联邦政府大范围限制军工生产,却没有配备相应的转产资金,导致斯洛伐克经济明显衰退。

表1 激进经济转型对捷克与斯洛伐克经济的影响

	1991年	1992年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捷克: -14.5%	捷克: -6.7%
	斯洛伐克: -16.4%	斯洛伐克: -8.3%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捷克: -32.2%	捷克: -0.8%
	斯洛伐克: -31%	斯洛伐克: -3.9%
消费品价格上涨率	捷克: 55.7%	捷克: 11.1%
	斯洛伐克: 60.8%	斯洛伐克: 10.1%
失业率	捷克: 4.1%	捷克: 2.6%
	斯洛伐克: 11.8%	斯洛伐克: 10.4%
贸易平衡占国内生产	捷克: 3.9%	捷克: 2.3%
总值的比例	斯洛伐克: -0.8%	斯洛伐克: -1.1%

资料来源: Rüdiger Kipke, Karel Vodicka, Rozloučení s Československom/ příčiny a důsledky Česko - slovenského rozchodu, Český spisovatel, a. s., Praha 1993, s. 168.

斯洛伐克更为不利的经济形势导致产生了三方面的政治后果。第一,对经济发展的失望强化了斯洛伐克精英和民众的民族情感,他们愈益谋求在联邦框架内最大限度地争取斯洛伐克的独立自主。执政的“公众反对暴力”和基督教民主运动呼吁斯洛伐克进行特别改革,要求建立独立、可自我调控的斯洛伐克市场。第二,斯洛伐克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尤其是斯洛伐克民族党利用糟糕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反对捷克的宣传。斯洛伐克人对未来的担忧以及对捷克人的不信任不断增强,指责联邦机构忽略斯洛伐克利益的声音越来越大。第三,在那些坚持激进经济改革的捷克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眼中,经济衰退严重的斯洛伐克成为捷克进步的阻碍和负担。于是,捷克右翼领导人逐渐采取摆脱斯洛伐克拖累的态度。

^① Eric Stein, Česko - Slovensko/konflikt, roztržka, rozpad. s. 232.

^② Jan Rychlík, Rozpad Československa - cesko - Slovenské vztahy 1989 ~ 1992, Academic Electronic Press, spol. s. r. o., Bratislava 2002, s. 129.

^③ Dušan Kováč a kol., Kronika Slovenska 2 - Slovensko v dvadsiatom storočí, Fortuna Print Praha, spol. s. r. o., Bratislava 1999, s. 500.

(三) 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以及选举行为的差异

鉴于对经济转型的到来心理准备程度不同以及经济转型开始后遭遇经济困境的程度不同,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有着显著的差异。

表2 1991年捷克与斯洛伐克民众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态度(单位:%)

	捷 克	斯洛伐克
完全赞同社会主义	1.9	3.6
比较赞同社会主义	10.1	17.8
不赞同也不反对社会主义	31.5	42.3
比较反对社会主义	26.8	18
绝对反对社会主义	29.7	18.3
完全赞同市场经济	60.3	31.8
比较赞同市场经济	28.6	37
不赞同也不反对市场经济	8.4	20.1
比较反对市场经济	2.4	7.7
反对市场经济	0.4	3.4

资料来源:Sociologické aktuality, 1992, ? .2, s. 12.

在社会主义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总体上显现出衰退趋势,这对捷克人的影响很大。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捷克斯洛伐克被苏军占领,“正常化”时期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与意识形态监督,使捷克人感到极度沮丧。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实行改革,一度唤起了捷克人改变生存状况的希望。然而,苏军不仅没有撤离,而且经济危机加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于是,捷克人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满急剧增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再抱有希望。即便在经济转型开始后陷入经济困境,捷克人依然对市场经济前景充满希望,对社会主义制度持否定态度。

斯洛伐克人没有对激进社会变革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仅是希望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激进转型后经济跌入严重困境使许多斯洛伐克人反对市场经济,同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评价比捷克人更为积极。

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态度,致使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加之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选举行为差异很大。在1992年6月议会选

举中,两个对国家权力安排和经济转型方式持完全不同立场的政党分别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获胜,直接导致了联邦国家的快速解体。捷克的中右翼政党都表示支持激进和快速的经济转型,而克劳斯领导的“公民民主党”更是积极倡导建立在私有制和个人主动性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改革,宣称继续快速和激进的经济改革是走出经济困境的唯一途径。斯洛伐克的政党普遍利用经济改革造成的高失业率来反对联邦政府采取的私有化方针,支持国家干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的领导人梅恰尔尖锐抨击联邦经济转型措施,批评它不适合斯洛伐克的实际情况,使大部分斯洛伐克人相信,他才是实现斯洛伐克民族抱负和改变现行经济转型方式的最佳人选^①。结果,公民民主党与“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分别赢得捷克民众与斯洛伐克民众的最大支持。政治倾向和经济转型战略大相径庭的两个政党,无法就组建联邦政府达成一致,联邦国家快速走向解体。

四 社会转型对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的影响

(一) 政治精英和民众民主意识淡薄

建立在民族原则基础上的二元联邦制国家运作良好的前提条件是,两个民族都有较为强烈的维持共同国家的政治意愿。否则,任何关于联邦安排的宪政制度均难以很好地发挥效用。在1989年政局剧变后,曾经长期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统一的权力垄断被打破,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民主传统的影响力极其有限。1991年,英国—德国政治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表示,在中欧后共产主义社会法律环境的改变很快,大约需要6个月的时间,经济转型和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大约需要6年的时间,而向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转型则需要很长的时间,大约需要60年的时间^②。

1989年以前,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长期生活于集权体制下,他们对西方的民主充满了羡慕之情。在他们眼中,西方的民主如同橱窗里展示的

^① Eric Stein, Cesko - Slovensko/konflikt, rozrška, rozpad. s. 84.

^② Karel Vodicka, Ladislav Cabada, Politický systém České republiky. s. 173.

东西那样美轮美奂。他们只看到民主好的一面,没有意识到民主会带来许多必须解决的矛盾和冲突。“天鹅绒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政治冲突的中心议题是捷克与斯洛伐克关系。鉴于捷克与斯洛伐克的政治精英都缺乏民主经验,他们都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加快解决国家权力分配问题的进程,因而使民主的解决方式没能得到充分的探索。为了维持共同国家的存在,在谈判中需要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但却不能带来任何快速的政治收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却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民族主义成为政治精英展示自己民族利益捍卫者身份和加强政治地位的有效工具,通过妥协达成一致的倾向越来越弱。

双方民众也把关于捷克与斯洛伐克关系陷入困境与一般的冲突混为一谈,对联邦议会议员们在一些问题上的争论不休表现出气愤、反感和烦恼,他们只希望快速解决问题。根据民意调查结果,多数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从来没有表示过希望两个民族分离,他们担心联邦国家解体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在1990~1992年,随着政治精英难以就共同国家的未来发展达成一致,认为联邦国家解体不可避免的人数逐渐增加。

另外,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相似,政局剧变后捷克与斯洛伐克民众的思想相当混乱。他们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变化感到惊慌失措,对许多问题困惑不已,缺乏清晰的看法与明确的态度。他们适应新的、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能力下降,突出表现在评判国家权力安排问题上。民意测验多次显示,不少民众对捷克与斯洛伐克关系存在形态的理解缺乏一贯性,经常变化,特别是斯洛伐克民众。1990年6月,在捷克,支持单一制、联邦制和民族共和国独立的比例分别为30%、45%和12%;在斯洛伐克,上述比例分别为14%、63%和13%。1991年11月,在捷克,支持单一制、联邦制、邦联制和民族共和国独立的比例分别为39%、30%、4%和5%;在斯洛伐克,上述比例分别为20%、26%、27%和14%。1992年3月,在捷克,支持单一制、联邦制、邦联制和民族共和国独立的比例分别为34%、27%、6%和11%;在斯洛伐克,上述比例分别为13%、26%、32%和17%^①。民众在政治取向方面感到茫然失措,导致产生了三方面消极影响。

第一,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政治领导人物受到民众欢迎。民众在政治方面的不成熟,促使他们渴望决断力强、能够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强势领导人物。在如此社会需求的推动下,梅恰尔和克劳斯这两位民粹主义政治家领导的政党在1992年议会大选中脱颖而出。大选后,这两位强人在组建联邦政府的谈判中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第二,意识形态和纲领模糊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在1992年议会大选中获胜。民众对国家权力分配问题感到茫然困惑,为该运动的竞选胜利创造了条件。“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宣称要加强斯洛伐克主权,要求通过斯洛伐克宪法,反对过于中央集权的联邦制,这对于多数斯洛伐克选民来说很有吸引力。然而,直至1992年议会大选,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从未明确表达对国家权力分配问题的设想。在选举纲领中,它灵活地提供了五种选择方案:联邦、邦联、联盟、比荷卢经济联盟模式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独立。对于上述五种选择方案,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不倾向于它们中的任何一种,仅表示由民众最终决定。这种选举策略迎合了民众的心理。根据1992年1月的民意调查结果,“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54%的潜在选民赞同某一种不确定的共同国家存在形式^②。

第三,民众消极接受共同国家解体的政治现实。1992年12月31日,凡尔赛体系的幸运儿——捷克斯洛伐克结束存在。许多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共同国家一分为二的结果,特别是捷克与斯洛伐克交界地区的成千上万个家庭。然而,在没有举行全民公决的情形下,共同国家解体并未引发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政治参与意识不强,使多数民众消极接受了联邦解体的残酷事实。

(二) 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

在转型初期较为混乱的选举环境下,选民被民族认同的旗帜所吸引,坚持民族纲领的政党在选举中往往获得成功。民族认同成为转型初期中东欧民众重要的认同,除了他们过高估计了民族

^① Carol Skalnik Leff,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 Nation Versus State*, p. 138.

^② Lubomír Kopeček, *Demokracie, diktatury a politické stranictví na Slovensku*, Centrum pro studium demokracie a kultury, 2006, ss. 171 ~ 172.

共同体保护其成员的作用外,还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民众渴望民族解放和自由,希望民族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第二,公民认同和公民价值观没能在中东欧国家生根。第三,缺乏可以平衡民族理念诱惑力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技巧。第四,在人们决定政权的特点前必须首先确定领地的地理和人际界限^①。

正因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框架内民族共和国的选民给予其政治代表民主合法性,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影响力上升。在1992年议会大选中,具有鲜明民族倾向的政治领导人梅恰尔领导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在议会大选中获胜,它被斯洛伐克选民视为斯洛伐克从布拉格中央集权主义或捷克优势地位中解放出来的象征。鉴于捷克获胜党公民民主党领导人也是坚持民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两党互不妥协,原本关于联盟的谈判很快转变为关于共同国家解体的谈判。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原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解体的共同原因之一是,坚持民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政党利用选民的支持在议会大选中获胜,继而成为民族共和国的执政党,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

对民族共和国的认同高于对联邦国家的认同,致使相当一部分斯洛伐克政治精英更愿意在斯洛伐克从事政治活动,而不愿意在联邦机构任职。他们担心,一旦离开斯洛伐克去联邦机构任职,就会使其在斯洛伐克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下降,从而削弱其政治地位。不仅因为他本人经常不在斯洛伐克,与斯洛伐克社会的联系减少,而且由于斯洛伐克民众对于在联邦机构任职的斯洛伐克人存在一种偏见,称呼他们为“联邦的斯洛伐克人”。绝大多数斯洛伐克人认为,在联邦机构任职的斯洛伐克人不应该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官员,而应该仅是斯洛伐克驻布拉格的公使。否则,他们就是斯洛伐克民族的叛徒。斯洛伐克人的民族认同如此强烈,而对国家的归属认知和感情依附又如此淡薄,这显然对联邦国家的永久存在不利。在为1992年议会大选而准备的进入联邦议会候选人名单中,多数斯洛伐克政党不是提名最优而是次优的政治精英^②。

不仅弱势群体斯洛伐克人民族情绪高涨,而且在联邦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捷克人不愿放弃自

身的历史性特权,不愿意满足斯洛伐克人成为平等伙伴的要求,致使在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很难形成一种宽容和融合的政治文化。一旦有政治领导人试图超越民族共和国的界限维护整个国家的利益,就会被指责为本民族的叛徒,如1990~1992年担任捷克政府总理的彼得·皮特哈特。鉴于捷克与斯洛伐克多数政治精英和民众高度强调民族利益,忽略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联邦国家的统一性受到严峻挑战。

结 语

2013年是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20周年。通过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我们可以发现,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共处一国68年后最终宣告失败,是历史、制度、社会心理、政治精英和现实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向西方民主制度转型仅是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的现实因素之一,但在社会全面转型背景下,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共同国家难以为继。

从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成立之日起就已存在的捷克与斯洛伐克民族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暂时被压制下去,但并没有消失。在1989年政局剧变后外界压力和中央控制骤减的情形下,捷克与斯洛伐克关系问题浮出水面。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都意识到,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必须根据新的宪政模式调整两个民族的关系。然而,转型进程的多重性、同时性和复杂性,对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关系的恶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政治转型进程开启后出现了政党政治地方化、宪政危机和滥用新闻自由等现象,促使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愈益疏离。围绕着经济转型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分歧加剧,相互成见越来越深,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转型初期政治精英和民众民主意识淡薄以及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也为联邦国家的解体播下了毁灭的种子。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Pavel Barša, Maxmilián Strmiska, Národní stát a etnický konflikt: Politologická perspektiva, Centrum pro studium demokracie a kultury, Brno 1999, s. 92.

^② Karel Vodicka, Ladislav Cabada, Politický systém České republiky, s. 167.

SUMMARY

Zhang Hong Based on combing of twenty years of its political changes, Ukrainian political change can be divided into system construction phase, exploratory stage and complete stag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on the system level, the inherent shortcomings i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is causing difficulties in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On the operating level, the elite's misconduct is the main reason caused confusion i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i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democratic solidarity in terms of a history and culture.

Jiang Li Dissolution of the Federation of Czechoslovakia was the result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national psychology, political elites and reality. Although the transition to a Western democracy is only one factor of disintegration of the Czechoslovak federation, but in the context of overall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are irreconcilable. So it's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e common country furth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transition process restructuring and digs out the reasons why dissolution of the Federation of Czechoslovakia from the angel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Guo Liancheng Since launch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Russia has been the taxation reform as both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change.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also were changed greatly and their impact on economy was increased. On the one hand, Russia's fiscal expenditure,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and the policy adjustments of the deficit and national debt intensified and reached initial results; on the other hand, tax policy, including simplifying the tax system, tax reduction, lighting tax burden, and abolition of preferential, were improved also.

Li Xin Russian collectivist ideology characteristics resulted in highly centralized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and vertical management. They severely hamp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market capitalism and economic relation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Western Europe and its rise of the strength were challenge and threat to Russia.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began to reform, eliminating serfdom and clearing the way for the capitalist development. However, all liberal reforms are halfway due to resistance by conservatives. This made the unique history of the reform and its reversal cycle with Russian characteristics. So far Russia has gone through six round of the game. The author revealed Russia's regularity of economic reform and its reversal cycle and predicted that Russia will be in a new wave of liberal reforms during Putin's third term of Russian President.